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文心雕龙》义疏

上册

吴林伯 著

根浚葉茂 實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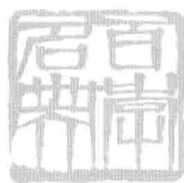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
义疏

上册

吴林伯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义疏(上、下册)/吴林伯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11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ISBN 978-7-307-11829-4

I. 文… II. 吴…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 ②《文心雕龙》—注释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9805 号

责任编辑:陶佳珞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66.25 字数: 949 千字 插页: 8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1829-4 定价: 17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宁津生	石 兢	刘经南
何克清	吴庆鸣	李文鑫	李平湘
李晓红	李德仁	陈 化	陈庆辉
卓仁禧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易 帆	谈广鸣	舒红兵	蒋昌忠
樊明文			

秘书长 李平湘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韩 进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费成	方 卿	邓大松	冯天瑜
石义彬	余双好	汪信砚	沈壮海
肖永平	陈 伟	陈庆辉	周茂荣
於可训	罗国祥	胡德坤	骆郁廷
涂显峰	郭齐勇	黄 进	谢红星
韩 进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吴林伯

湖北宜都县人，1916年出生，1998年去世。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后入复性书院，师从马一浮、熊十力诸先生。先后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中文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毕生精研群经诸子，尤致力于《文心雕龙》研究。著有《〈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周易正义》、《论语发微》、《老子新解》等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自序

盖闻古来作者，异代接武，莫不辨雕万物，智周宇宙，仰观俯察，断辞正言，启晨光于积晦，澄清流以一流，是以众书失实，浮文防要，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传兹抵牾，欺惑愚众，道术将为天裂，则王充《论衡》生焉；近代辞人，率好诡巧，逐奇苟异，妍媸混成，良质为瑕，通衢坦夷，而多行捷径；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每下愈况，不可为训，则刘勰《文心》兴焉。余少驽钝，无他艺能，遂笃志文章，尤究心五十之篇。齿在志学，便朝讽诵，洞鉴东莞博物，不翅于胥臣、子产，搦笔论文，体大而思精，乃有予夺、臧否，其为贯穿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发明，密已甚矣。余以寡昧疑启之身，南北游走，学殖久落，焉能析其指归，殚其体统，深造自得也哉！昔梁征士刘孝标作《叙传》，尝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而余不自揆，亦窃拟于扬子云者有一焉。何以知其然？扬雄草《太玄》，历年未就，当时或以哂其徒劳。余撰《义疏》，屡移寒暑，熔意练词，不知所裁，常恐酱瓿之讥；然知难而进，旧典攸昭，妙识所难，其易将至，先难后获，自然之数也。且不远千里，择师而事，终入马先生之门，执贄请为弟子，亲承音旨，不同研味遗言，探赜索隐，日不暇给、知至至之，欲与几也。夫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怵方美，简练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进而不知退，旁通发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匪解，俾学有辑熙于光明。但虑动难圆，病昌言之弗属，谦尊而光，岂怀盈而自足，姑放庸音，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故不惧我书与粪土同损，烟烬俱灭；亦不冀君山复出，以为绝伦必传，好学修古，实事求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义疏	18
原道	18
征圣	38
宗经	54
正纬	79
辨骚	91
明诗	117
乐府	148
论赋	168
颂赞	191
祝盟	204
铭箴	216
诔碑	228
哀吊	240
杂文	250
谐隐	263
史传	277
诸子	305
论说	337
诏策	364
檄移	379

封禅	393
章表	403
奏启	415
议对	430
书记	445
神思	469
体性	488
风骨	511
通变	532
定势	554
情采	577
熔裁	602
声律	616
章句	630
丽辞	656
比兴	671
夸饰	695
事类	711
练字	738
隐秀	762
指瑕	770
养气	793
附会	808
总术	823
时序	838
物色	885
才略	905
知音	976
程器	996
序志	1015

绪 论

众所周知，古籍的注释，渊源甚古，先秦已有了。像旧说春秋孔子的《周易传》、左丘明的《春秋传》、战国韩非的《解老》……都是早期的注释。再到刘汉，注释日益兴起。当时，所谓“经学”，主要是注释，而且逐渐推广到各个学术领域，读者把它当做钻研古籍的工具，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终身的专业。经典性的古籍，注释竟达千百种之多。而注释的名称也不一律。比如两汉经籍的注释，或者叫“传”，或者叫“笺”，或者叫“解故”，或者叫“章句”……六朝人又叫“义疏”。《周易》、《诗经》、《春秋》、《周礼》、《仪礼》、《孝经》、《论语》、《老子》、《庄子》……都有《义疏》。

我注释《文心》，根据读者的要求以及个人的想法，制订《义疏》的体例，就是每篇原文，分段排列，而每段后面的《义疏》内容，不外字词的解说，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讲，思想理论的分析、评议。而且，我在写作《义疏》的全过程中，注意了以下诸方面：

一、从广大读者现有水平出发。目前，中青年读者阅读古籍的能力一般不高，迫切要求出版适合他们程度的注释。换句话说，注释要通俗些。这里，我们应该指出：通俗与否，是以读者的水平为标准的。同一注释，随读者水平的高低，而有通俗或深奥的区别。譬如东晋陶潜的诗里，常用《论语》中的词意，在古直《陶诗笺》以前，很少注出。这不是注者不懂，而是没有注的必要。因为那时陶诗的读者，读过《论语》，而《论语》是童而习之的书，在他们看来，不注仍不失为通俗。可是现在的中青年人读了，就可能有人认为不通俗了。《文心雕龙义疏》针对这种情况，介绍作者，都用语体，不是史传的摘录，典故也用白话简述它的来历和在本篇所表达的意思。万一

征引原文，便先加注释、今译，然后释义，不使注成为古文的积累，使注还要注。与此同时，《义疏》留心文化知识。本书《情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义疏》先释词：“老子，春秋末叶哲学家。疾，痛恨。信，真实。”后析义：“老子厌恶虚伪，所以他在其《道德经》里指出：‘美言不信。’而他心目中的‘美言’，无异孔子指斥的‘巧言’。”荀卿所谓“口行相反”（《荀子·致士》），今人说的“花言巧语”，一点也不真实。假如像有的注所言“《老子》，‘美言不信’”，征引原文了事，不通晓《老子》的读者，肯定会觉得不通俗，甚至发生误解，以为老子反对语言的美丽。其实，他的《道德经》，语言纯粹，一向被称为哲学诗，而《情采》下文以《道德经》的语言“精妙，并非弃美”。本书《体性》：“习有雅郑。”《义疏》释雅郑：“旧题《毛诗序》：‘雅者，正也。’郑，本春秋国名。《论语·卫灵公》记孔子批评郑国的音乐：‘郑声淫。’又《阳货》载孔子不满郑国的音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后世谈音乐，常常雅郑并提，本篇以雅郑比喻人们习惯的邪正。”要是像有的注所言“雅正，犹言雅俗”，读者可能会觉得不通俗。再者，《义疏》为了通俗，还注意到时空观念。本书《时序》“暨皇齐驭宝”的“齐”，《义疏》指为南朝的齐代，使不与北朝的齐代相混。《通变》“宋初讹而新”的“宋”，《义疏》指为南朝刘裕建立的宋代，省称刘宋，使不与赵匡胤建立的宋代（省称赵宋）相混。言曹操，《义疏》指为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魏武帝。说颜之推，《义疏》指为北齐人。这样时、空分明，不但通俗、清楚，而且有助于文义的理解。

二、理论结合实际。文论是从创作实际总结出来的。以中国古代卓越的文论家而言，作《典论·论文》的曹魏文帝、著《文赋》的西晋陆机、撰《诗品》的萧梁钟嵘与本书作者刘勰等都是不平凡的作者。李唐姚思廉《梁书·刘勰传》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而勰的“文集行于世”。本书辞采的简括、形象、优美，可当文学作品读。而刘勰论文，大都有所为，我们研究本书，不能脱离文坛实际。故每篇《义疏》的第一条，多为解题，阐明本篇所以写作的时代背景。《情采》的《义疏》第一条：“两汉以来，特别是

刘勰所处的南朝，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腐朽异常，文学相应地颓废，文坛形式主义猖獗，诗赋的辞章，趋于‘淫侈’。本篇反对‘淫侈’，强调‘文质附乎情性’，正是缘事而发。”

至若正文的《义疏》，一者结合作家、作品。事实证明，刘勰作本书，为的是品题先秦、两汉、魏、晋、南朝（止于南齐末）的文学，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他作本书以前，对过去和当世的作家、作品，都有所探索，用来论文，则言不虚设，他评论作家、作品，都“持之有故”，每每要言不烦，“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本书《才略》评论曹魏嵇康，一言以蔽之曰：“嵇康师心以遣论。”《义疏》先释词，后解义。战国庄周《庄子·齐物论》指责辩士的自以为是：“夫随其成心而师之。”师心，以心为师，师，名词用为意动词。是说嵇康立论，能独立自主，思想通脱，畅所欲言，不剿说苟同。鲁迅谓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可移作“师心遣论”的注脚。《义疏》就此止步，仍嫌抽象，紧接到《嵇康集》里找证据。西周武王死，成王继位，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位，于是挟持武庚作乱。周公奉成王的命令，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世人以为管、蔡作恶，嵇康否认这种说法，他作《管蔡论》以为管、蔡是周朝的忠臣，否则，周文王不会信任他们，他俩不识周公摄政是一时权宜之计，因而怀着忠周的心，反叛周公，不是作恶。《嵇康集》里的《难〈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等，也都是反对旧说的论文。综观嵇康的这类论文在其作品中占上风，所以刘勰特为提及，这不意味着嵇康思想通脱的文章只限于论文，而《嵇康集》里有“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过数量不及论文罢了。而《嵇康集》里的诗也不差，本书《明诗》称其“清峻”，然而视其论文逊色，故存而不论。论作家，举其文章最优秀者，不在一处一一叙列，这是刘勰论文的特点。

二者结合文学史。本书的许多篇章，都与文学史有关。《时序》是上古、中古的文学史，《明诗》是上古、中古的诗史，《诠赋》是先秦、两汉、魏、晋的赋史，《乐府》是上古、中古的乐府史，有通

史，也有专史，《义疏》都紧密结合了文学史。《明诗》：“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义疏》结合文学史，指出西晋怀帝永嘉以来，社会空前险危，曹魏齐王正始融合老、庄的玄学进一步渗透文坛，东晋偏安江左，而“玄风独扇”（萧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宋初年，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加剧，不少被排挤的官僚文人，失志不平，无力反抗，只好暂时隐避山林，发言为诗，则偏于山水的刻画，诗的主要内容，易“玄气”为山水，谢灵运的诗可为代表，这就是诗这一文体的“革”；然而诗的形式，更加追逐汉来的“淫侈”诡巧，“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这就是“因”。《情采》批评“后之作者”“为文造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显然有的放矢。《义疏》结合文学史，指出这是隐射晋宋诗赋家的虚伪。在他们的作品里，“真宰弗存，言与志反”，不存在真情实感。晋宋玄学风行，连奢侈的御用文人也清谈老、庄，伪装恬淡，波及文坛，诚如刘勰所云。西晋的石崇，常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强使客饮，客饮不尽，就杀美人，沉湎酒食，一至于此（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汰侈》）。又崇在荆州刺史任内，劫夺杀人，以致巨富（萧梁刘孝标注引东晋王隐《晋书》），供其挥霍，生活糜烂到如此地步；他与“趋世利”的潘岳谄事权臣贾谧，每候其出，望尘而拜；但他因仕途坎坷，作《思归引》，扬言“少有大志，夸迈流俗，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藪，傲然有凌云之操”。潘岳和石崇一样，他作《闲居赋》，以老、庄自饰，声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又作《秋兴赋》，表示要“逍遥乎山川之际，放旷乎人间之世”。谢灵运性豪奢，仕宋，自谓才能出众，宜参权要，被贬为永嘉太守，意不自适，就大修别墅，放浪山水，不忘腾达。可是他写山水诗赋，则援佛、老，标榜清高。或曰：“心放俗外，投吾心于高人。”（《山居赋》）或曰：“昔余游京华，未尝废邱壑。”清顾炎武斥其“以文章欺人”（《日知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这些作者，都在笔下显示其虚伪性，真是言不由衷，“为文造情”。

三者结合创作经验。本书的某些论点，从前人和它的作者的创作经验得来。《神思》：“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练字》：

“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附会》：“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这些都是作者的甘苦之言，经验之谈，没有创作实践的读者，便很难深切地了解。《义疏》一一参证，使从抽象到具体。

三、辨正原文及其旧说的讹误。注释古籍宜“钩深至远”，“辨是与非”，不能作纯客观的叙述。德国作家歌德在《莎士比亚以及没有他的止境》这篇文章中说：“卓绝的大师所写的一切，并非都是卓绝的。”这是古今中外学者所共同遵循的科条。真正的学者不相信“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的讹言。奴性十足，脑子给他人跑马的人不能发展学术。在崇儒、尊经的东汉，王充以“疾虚妄”（《论衡·自纪》）自任，悍然“问孔”“刺孟”，非訾《论语》《孟子》里的若干章句；李唐刘知几《史通》的《疑古》《惑经》，继承、发扬了这种科学态度。凡是精读本书的读者，便知道刘勰也有这种精神。他“品列成文”，有的“同乎旧谈”，有的“异乎前论”，不“雷同”“苟异”（本书《序志》），不是强有力的证明吗？他从思想上认识“虑动难圆”，谁都“鲜无瑕病”（本书《指瑕》），我们肯定他为南朝卓绝的文论家，不妨碍辨正本书若干讹误。这在上文讲了一些，现在，我们还可补充两点：《知音》以秦始皇囚系、毒死法家韩非，西汉武帝不重用赋家司马相如，是“贵古贱今”。《义疏》辨正此说，以为秦自孝公用法家商鞅变法，法术思想一直被秦王朝采纳。始皇原先倾心韩非，是政治思想投合的表现。韩非虽然是儒学大师荀卿的学生，政治思想却集申、商法、术之大成，为同门、法家、秦丞相李斯所赏识，而李斯的学养不及韩非。李斯辅佐始皇推行法治，沿用韩非学说。《论衡·书案》：“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殊不知韩非被始皇招引到秦国，李斯实以权势嫉妒他，与姚贾诽谤他，始皇给谗言迷惑，终于囚系、毒死他，哪是“贵古贱今”呢？司马相如尽管是赋家，却有济世志，倘用鲁迅的话说，本想为武帝“帮忙”，临终还作《封禅文》劝喻武帝，企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武帝以为“言语侍从之臣”（班固《两都赋序》），若倡优畜之，要他“帮闲”，不踞要津，又哪是“贵古贱今”呢？《事类》：“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与天资为同义词，是天

赋。刘勰为其唯心的天才论所囿，哪怕“才”、“学”并举，到底分清主、佐，而以“才”为主，是创作成败的决定因素，而他论文，也就把作者的“才”放在第一位，《义疏》辨正此说，以为人的天赋或素质是人生来就有的一定的生理和解剖的特征。应该肯定，天赋或素质在人的能力发展中起着作用，它是人的能力的自然因素，而人的能力的发展的决定因素却是后天的学养。刘勰唯心的天才论，散见本书，《义疏》随时辨正。至于论品本书的旧说，长短互出，《义疏》严予鉴定，长者服从，短者辨正。郑玄与西汉毛萼治经，同属古文学派。而玄“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六艺论》）。郑《笺》对毛《传》，因沿、引申、补遗，提高毛《传》，而玄不愧为毛公的诤友、功臣。《义疏》始终师范郑《笺》，商榷古今校注。《辨骚》：“酌奇而不失其真。”唐写本以本书时或奇正相对为文，改真为贞，贞之为言正也，以便奇与正相对，实不烦改字，因为真亦可训正。《古诗十九首》：“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李善注：“真，犹正也。”《通变》：“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元本则作财，亦不烦改字。今本作则，文从字顺。东晋郭璞《尔雅图赞》：“永观厥祭，时维文则。”文则本为陈言，《通变》因之，则犹下文“文律”，此词初见于西晋陆机的《文赋》，是说修辞的基本规律。《史传》：“荀况称‘录远略近’。”考《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刘勰曰：“录远略近。”与荀义不悖。《史通·烦省》因以为言：“昔荀卿有云‘录远略近’。”前人征引旧辞，或括其义，而不拘原文。录远句如之。清浦起龙著《史通通释》，以刘勰误引荀文，改曰：“远略近详。”不识“略”字后省略介词“于”，有“比”的意思，谓作史记，记录远代之事，要比近代的简略，下文称俗人“爱奇”，作史记“录远而欲详其迹”，与此乖忤，故知几从而非之。今人的校注，值得商榷的，《义疏》也不忽视。《夸饰》：“至《东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有人注：“此云《东都》，盖误记也。”未谛。顾炎武说：“古人为赋，多假设之辞，叙述往事，以为点缀，不必一一符同也。”其他文体，也或这样，文学语言，不限于真人真事。六朝人好

作骈语，喜调声律，放言遣词，假设是常有的事。沈约《钟山诗应西王教》：“南瞻储胥观，西望昆明池。”李善注：“储胥观、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李注正言假设，不称“误记”。刘勰不越时尚，行文讲究对仗和音乐性，用事也有所假设。比目鱼诚然见于班固的《西都赋》，为了东、西之对，易西为东，不得以假设为“误记”。同样，《神思》：“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一纪，三十年。范晔《后汉书·张衡传》称衡作《两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李唐太宗御撰《晋书·左思传》称思作《三都赋》，“构思十年”。刘勰为文句对仗，改十年为一纪，也不得以假设为“误记”。古人用事的假设，另有不拘事之先后次第的，这在本书中经常出现。夏在商前，而《史传》则曰：“商夏。”并非误倒，而有的注者竟误会。《诏策》：“安和政弛。”《时序》：“自安和已下。”东汉和帝本在安帝之先，而刘勰置于安帝之后。有的注：“按安和当乙，始合时序。”有的说《诏策》篇“‘安和政弛’，误与此同”。又有的注同然一词：“安和当作和安。”本书不乏类似的词例。扬雄生在司马相如之后，而《练字》则曰“扬马”。周幽王生在厉王之后，而《时序》则曰“幽厉”。庄周生在老聃之后，而《明诗》则曰“庄老”。我们晓得，构词若兹，自古而然。夏在冬前，而《庄子·德充符》则曰“冬夏”。禹在汤前，而《离骚》则“汤禹”。暑在寒前，而《周易·系辞下》则曰“寒暑”。“幽厉”早见于《孟子·离娄上》。刘勰以约定俗成的词法造语，岂可若有的注云“当乙”。《时序》：“至（曹魏）明帝纂戎。”纂戎无旧注，今注：“纂戎，好比说‘一戎衣而有天下’，就是说‘在战争中继承了皇位’。”按《尚书·武成》称西周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谓武王以武力诛纣、灭商、建周而为天子，此今注所本，不妥。《诗经·大雅·烝民》：“纘戎祖考。”郑玄笺：“戎，犹女也。”女，同汝，你。潘岳《杨荆州诔》：“纂戎洪绪。”李善注：“《毛诗》曰：‘纂戎祖考。’善易纘为纂，以符潘诔。”纂，犹赞，继也。岳暗用经文，赞乃易以同义词纂曰“纂戎”，成为常语。西晋傅玄《晋鼓吹曲·平玉衡》：“纂戎洪业。”陆机《赠弟士龙》：“纂戎列祚。”机弟云《祖考颂》：“我

考纂戎。”刘宋少帝《慰劳高句骊王高琨诏》：“纂戎东服。”文帝《下百济王余映诏》：“远王纂戎。”《时序》“纂戎”为“纘戎祖考”的歇后语。戎由人称代词汝活用为其他的。明帝句言曹魏明帝继承他的祖考操、丕的业绩而为天子。《知音》：“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有的注：“按其疑匪误。”又有的注：“按其下疑夺不字。”不可从。《汉书·东方朔传》：“朔之诙谐，其事浮浅。”《知音》“其事”句虽同旧文，而义自异，乃就上文扬雄语论断，其字下省略“不”。前人为行文之便，有省略“不”的先例。《春秋左氏传》里有很多省略“不”的语句。僖公二十一年传：“天欲杀之，则如勿生。”“如勿生”，不如勿生也；二十二年传：“若爱重伤，则如勿伤。”“如勿伤”，不如勿伤也；昭公十三年传：“若求安定，则如与之。”“如与之”，不如与之也。二十一年传：“若爱司马，则如亡。”“如亡”，不如亡也。余不备举。刘勰亦用成法。本书《论说》：“曹植《辨道》……论如其已。”“如其已”即《春秋左氏传》昭公三十一年“不如其已”。故《知音》的“事”非“匪”字之误，其上也非夺“不”字。总之，《义疏》对本书及其旧说，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不一概相量。

四、从整体出发。我们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问题的整体，反对形而上学。古代有着朴素辩证思想方法的学者，都非常重视这点。庄周不赞同“一曲之士”的“不该不偏”（《庄子·天下》）。荀卿昌言观察事物，务必全而不“偏”，“偏”就“生暗”（《荀子·不苟》）。怎样叫“偏”？他说：“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怎样叫全？他说：“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同熟）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荀子·不苟》）在他看来，“偏”就是“蔽”，认识的“蔽”非“解”不可，于是作《解蔽》，发端则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刘勰文论，洋溢朴素的辩证法（我已另为文论之）。加上他作本书，受到骈文的限制，论述不能像散文那样的在一处条分缕析，而又不能挂一漏万，只好依仿孔子作